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4.007

# 美国“9·11”小说人物形象的历史文化阐释

王薇

(青岛大学 外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9·11”恐怖袭击事件已成为当代美国历史进程中“一种新的起源创伤”。作为书写历史的重要媒介,美国“9·11”小说在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逐渐呈现重述历史、重构文化的新特征。从历史与文化双重互动的角度来看,美国“9·11”小说中“坠落的人”“走钢丝的人”“陌生人”三类人物形象展现了后“9·11”典型文化形象的不同生成过程和文化价值:“坠落的人”代表了后“9·11”文化“断裂”语境中相对稳定而凝固的历史感知者形象;“走钢丝的人”借由发生于1974年杂技艺人在世贸双塔间走钢丝的历史事件“预见”21世纪之初的“9·11”事件,从而成为隐喻历史进程中如何凭借对称性与规律性实现文化“修通”的历史预见者形象;而作为人际交往中集体意象的“陌生人”形象,凭借唤起“自我与他者具有差异性的共同卷入”的书写方式,成为弥合“断裂”、着眼未来的历史超越者形象。美国“9·11”小说三类人物形象在后“9·11”语境中通过展演、重塑历史意识,承载感知、预见、超越等文化使命,不断创造性地释放文学价值。

**关键词:**美国“9·11”小说;人物形象;坠落的人;走钢丝的人;陌生人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4)04-0050-07

“文学作品是传播个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有力模式。”<sup>①</sup>在这个传播过程中,文学作品,尤其是书写历史的小说中,林林总总的人物形象凭借其特有的虚实结合建构方式,对文化记忆起到了或凝固、或反思、或重塑的作用。“9·11”事件发生二十余年来,恐怖暴力事件引发的恐慌与焦虑,逐渐演变成人们对剧变文化“断裂”的反思和如何“修通”文化秩序的思考。康奈尔大学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在《书写历史,书写创伤》(*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2001)一书的再版序言中,强调“9·11”恐怖袭击事件在美国当代历史进程中已然成为“一种新的起源创伤(founding trauma)”<sup>②</sup>,与美国最早的两场起源创伤——南方奴隶制和美国内战一样,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历史上最重要的创伤性事件。

作为再现这场创伤性历史事件的重要媒介,美国“9·11”小说在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特点。鉴于美国“9·11”小说明确的历史书写指向,国内外现有美国“9·11”小说中人物形象的评论大多基于历史视角开展研究。有学者指出,“坠落的人”隐喻了那些被动的、充满悲剧意味的“9·11”受害者,以德里罗为代表的以“悲情叙事”为聚焦点的美国“9·11”小说是此类隐喻文学的范式,而麦凯恩笔下的“走钢丝的人”,则以那场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在世贸双塔间的走钢丝事件记忆为参照,重提这个过往事件中“永远不会坠落”的人物形象,为当下的人们重新唤起积极的、肯定的观感<sup>③</sup>。在《文学、电影与文化记忆的媒介性》一文中,文化记忆学者阿斯特莉特·埃尔探讨了那些“能够催生、铸造关于过去的集体意象”<sup>④</sup>,强调“集体意象”在文化记

收稿日期:2023-03-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1FWWB018)

作者简介:王薇(1981—),女,山东青岛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当代美国文学及文化研究。

①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文化记忆研究指南》,李恭忠、李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33页。

②Dominick LaCapra.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xiii.

③王薇:《看与被看:〈转吧,这伟大的世界〉中的历史景观书写》,《当代外国文学》2015年第3期。

④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文化记忆研究指南》,李恭忠、李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84页。

忆生产过程中的多重互动功能。美国“9·11”小说中的典型集体意象——陌生人形象,代表了这场创伤性历史事件中的集体声音。本文从典型人物形象重述历史、重构文化的作用入手,着重分析美国“9·11”小说中“坠落的人”“走钢丝的人”“陌生人”三类人物形象如何被塑造并生成后“9·11”文化形象的过程,阐释其在历史语境中隐喻“断裂”时刻、在过往历史中找寻“修通”之径、在未来畅想跨越之路中所发挥的文学价值。

### 一 “坠落的人”:文化“断裂”的历史感知者

塞缪尔·海因斯(Samuel Hynes)曾以“对历史断面的感知”论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战后文化产生的影响<sup>①</sup>。“9·11”事件发生之后,许多美国人将自己看作是新世纪美国“历史断面”的感知者,认为前“9·11”时代的文化秩序在2001年9月11日这一天发生了“断裂”,“9·11”事件从根本上动摇了二百多年以来形成的所谓“亚当式”国家认同的传统与根基。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时间沉淀,“9·11”事件在人们回顾创伤、反思往昔的过程中应被赋予何种历史意义?从19世纪传承下来的美国“天真之歌”是否由于这场事件的空前残酷而分崩离析了呢?人们以何种方式回忆“那一天的坠落”?“坠落的人”,指的是那些身陷世贸中心顶层大火、不愿葬身火海而决定从双子塔一跃而下的遇难者,其形象随后不断出现在《纽约时报》《时尚》杂志和纪录片中,通过诸多跨媒介形式的再现,成为见证“9·11”事件的第一个标志性形象。

在文学创作领域,多部美国“9·11”小说以虚构想象的方式,不断再现身份各异、形态各异、故事各异的“坠落的人”,“坠落的人”成为美国“9·11”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之一。如果说,通过新闻报道、纪录片等媒体再现,“坠落的人”这一人物形象逐步得以凝固化、稳定化的话,那么美国“9·11”小说中的“坠落的人”更多地借助文学虚构特性将这一文学形象多样化、灵活化。美国作家德里罗(Don DeLillo)的小说《坠落的人》(*Falling Man*, 2007)自出版之日起便好评如潮,

被称为是“‘9·11’小说定义之作”。这部小说中的“坠落的人”以鲜明的文学特质,唤起、重塑并反思了照片中这个21世纪最绝望的意象。具体来看,小说家德里罗以“反叙事”的创作观对《纽约时报》上那幅人尽皆知的照片进行了文学逆写,从而重新定义了“9·11”小说。小说一改这个代表着绝对死亡、绝对虚无的“21世纪最绝望的意象”,赋予无名“坠落的人”以名字、身份和故事,并把“坠落的人”在“9·11”事件中的恐怖画面转化成为街头行为艺术家进行的反复表演。通过叙述故事和仪式化的表演,小说削弱了摄影作品中单向度之人必然“向死而去”的暴力恐怖之感,充分体现德里罗运用“回到人性的基本层面”的反叙事手法,产生了“坠落的人”的文化记忆价值,使其不断坠落的身体有了“向死而生”的希望。

德里罗以一位街头行为艺术表演者的名字“戴维·雅尼阿克”命名小说第三部分,可见其在整个文本中的重要地位。小说中,这位街头行为艺术表演者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多次表演从高处坠下的“坠落的人”行为艺术。女主人公丽昂两次在街头与雅尼阿克的表演不期而遇。第一次是在“9·11”事件发生十天后,丽昂在中央车站上班族行色匆匆的“通常秩序”中,突然有一个景象吸引了她的目光,“一名男子悬荡在那里”<sup>②</sup>。“9·11”事件发生一个多月以后,丽昂第二次遇到雅尼阿克,“他仿佛从地底下冒了出来”(《坠》:172)。丽昂与雅尼阿克的两次相遇,“不期而遇”是典型特征,突发性和偶然性给观者带来的直接感受是不可知的“死亡”突然降临的震撼。

小说的后半段不断展现这位街头艺人更多的身份信息 and 故事,让“坠落的人”人物形象更加具体可感。小说中,“9·11”事件发生六年后,丽昂在报纸上偶然看到一则不起眼的“讣告”:“一个名叫戴维·雅尼阿克的人,三十九岁。死者生平 and 死亡原因的文字非常简短。没有照片,一个句子一笔带过了那些行为,说他是行为艺术家,被称为‘坠落的人’。”(《坠》:239)然而,讣告中一笔带过的毫不起眼之事,却让丽昂回忆起在偏僻街头看到的那一幕,她在网络中搜索着有关“坠落

<sup>①</sup>Samuel Hynes. *A War Imagined: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English Culture*. London: Collier Books, 1992, pp. xi.

<sup>②</sup>唐·德里罗:《坠落的人》,严忠志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4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的简称“《坠》”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的人”的文字信息和图片信息：“坠落的人”“冷酷的自我表现者”“恐怖时代的勇敢的新型记录者”（《坠》：240）。从这个角度看，丽昂将自己视作“坠落的人”表演的直接观众，以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感受那一幕，“他是一位坠落的天使，他的美丽令人感到恐怖”（《坠》：242）。正如丽昂感受到的，“坠落的人”的神秘感并没有因查阅到更多的信息而减弱；反之，“坠落的人”在后“9·11”观者的文化记忆中，进一步演变成为具有神秘感、甚至某种崇高感的人物形象，生动地承载着寻常个体的日常记忆。

从历史书写角度看，街头艺人对“坠落的人”进行的反复表演，是一种使人物形象凭借反复操演而产生的强迫性记忆行为不断地提醒文本内外的旁观者：“那一天”（2001年9月11日）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已经“缺席”。换句话说，通过观看行为艺术表演，观者实现的是对历史时刻的间接感知。通过对街头艺人反复表演的叙述，德里罗将“9·11”事件转化为一场过往的历史事件。本质上看，“坠落的人”表演内容已并非“9·11”事件所凝结的瞬间记忆本身，而是在或反复操演、或切割重组、或调遣变形的过程中生成一种“被记忆所解释的习惯”。也就是说，由于表演“过去”，“坠落的人”在动态呈现“绝望”与“死亡”等事件记忆的过程中，实现了对历史事件的别样感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进一步解释《纽约时报》上刊登的摄影作品与小说中的“坠落的人”文学形象之间的本质差别：摄影作品通过事件瞬间记忆的凝滞和停顿而凝结成文化“断裂”时刻的闪光灯记忆；与之相对，小说中展现的街头艺人的反复表演，打破了静态、中顿、凝滞、碎片化的表现模式，实现了动态、延续的历史事件的感知样式。“坠落的人”这一人物形象从被动的、悲剧的“绝望意象”转变为具有能动性的、积极的文化形象。

由此，“坠落的人”成了后“9·11”时代那场恐怖事件“断裂”时刻的历史感知者。“9·11”小说凭借将凝固的记忆瞬间反复展现，使人物形象进一步超越凝固，实现了动态的美学处理。美国“9·11”小说中反复描摹的“坠落的人”，以文学想象重塑人物形象，能凭借人物形象由静止到动

态、由单次同质记忆到反复异质记忆的不同美学方式，产生具有反思性、创造性的后“9·11”文化记忆。目睹“坠落”中的静止，不同于《纽约时报》照片中那个定格的静止瞬间，行为艺术表演中的动态“坠落”让观者体会到某种神秘与崇高——在这一切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它并不属于这里，高高在上”（《坠》：4）。有学者曾将这一“高高在上的存在”解读为“无限向下坠落的过程对日常语言与思维的阐释的拒绝”<sup>①</sup>，在美国“9·11”小说《转吧，这伟大的世界》中，另一个典型人物形象“走钢丝的人”，则对《坠落的人》中虚空缥缈的“高高在上的存在”进行具体实感地呈现。作家麦凯恩利用“走钢丝的人”行走于世贸双塔间这一空间位置上的优越性，将叙事时间拉回至世贸双塔刚刚落成的20世纪70年代，在时间回溯中，塑造了一个“不会坠落的”，具有平衡和救赎意味的历史预见者形象。

## 二 “走钢丝的人”：文化“修通”的历史预见者

在《“9·11”小说：创伤、政治与身份》（2014）中，基布尔对美国“9·11”小说进行了主题层面的历时归纳，指出2005年至2007年间涌现的美国“9·11”小说作品愈发展现出“对日常生活断裂处的末日想象”<sup>②</sup>。前文所论在美国“9·11”小说中重复出现的“坠落的人”形象，恰如其分地展现了“日常生活断裂处”的文学表征，点明后“9·11”文化语境中历史记忆的新特征：随着“9·11”事件的反复、媒体过度报道与多媒介传播，这场恐怖事件的后续影响已不只是局限在政治争端、文明冲突、反恐战争等宏大议题之中，而是渗透在普通民众的日常记忆中，而这愈发加剧了创伤“修通”的难度。文化研究学者卡普兰（Ann Kaplan）在创作于“9·11”事件之后的著作《创伤文化：媒体和文学中恐怖和失落的政治》中，大力倡导以文化“修通”的方式走出创伤：“（讲述创伤）故事尽管无法真正重复或再现过去发生的事情，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受害者实现‘修通’（working through）。它可能会带来一种共情的‘分享’，从

<sup>①</sup>顾舜若：《从书名“坠落的人”看〈坠落的人〉中的死亡书写》，《外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sup>②</sup>Arin Keeble. *The 9/11 Novel: Trauma, Politics and Identity*. Jefferson: McFarland, 2014, pp. 13-15.

而让我们继续向前,哪怕只能向前咫尺……”<sup>①</sup>历史文化学者拉卡普拉进一步论述卡普兰所言的“修通”在历史的维度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在当下谋求与过去的一种建设性关系,并在此过程中朝着‘修通’的目标努力。”<sup>②</sup>

美国“9·11”小说中,“走钢丝的人”成为一个具有“修通”意味的人物形象,从历史回溯的角度表达历史意识,从而修通当下文化中的“断裂”。作家科伦·麦凯恩在“9·11”小说代表作《转吧,这伟大的世界》中,将两场同样发生在世贸双塔间的历史事件纳入同一视域,以映照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影像的“走钢丝的人”,预见21世纪的“9·11”事件,结合21世纪后“9·11”语境,以强调“修通”意味的人物形象,昭示当下个人心灵与社会文化危机中的救赎力量。麦凯恩用“走钢丝的人”串联起全书20多个人物的故事,此外,麦凯恩还在小说中插入了全书唯一一张照片,使得两场发生在世贸双塔间的事件实现了视觉上的并置效果。这张拍摄于1974年8月7日的照片,恰是法国杂技狂人佩蒂在世贸双塔间进行走钢丝表演的日子。小说这样描述道:

一名男子在空中行走,一架飞机正在消失,似乎是要消失进楼的边缘。历史的小小碎片遇见更大的历史碎片,仿佛那走钢丝的人能预见到以后会发生的事。时间和历史的侵入。不同故事的撞击点。我们等着那一声爆炸,但是爆炸一直都没有发生。飞机过去了,走钢丝的人走到了钢丝的那一端。世间事物不会就那么土崩瓦解<sup>③</sup>。

在这段叙述中,“走钢丝的人”与正在消失的飞机并置,使得两场发生在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的“事件”产生了关联,这张照片中“走钢丝的人”也成为连接起两场历史事件的象征性人物形象。在整部小说中,这张照片还起到串联多个虚构人物、推动故事进程的作用:在1974年佩蒂进行走钢丝

表演的同一天,女主人公爵丝琳的母亲与爱尔兰修士科里根遭遇车祸丧生。若干年后,爵丝琳无意中获得这张照片并一直珍藏在身边,因为这张照片凝结了爵丝琳对母亲的回忆与想象。照片中,1974年走钢丝事件和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这两场时隔二十七年的事件,得以穿越时间的界限,产生某种关联——世贸双塔间“走钢丝的人”与撞击双塔的飞机,预示着失衡与平衡共存,沟通与毁灭同在。

除了小说《转吧,这伟大的世界》中的“走钢丝的人”形象,2006年9月11日《纽约客》杂志的封面和2008年上映的纪录片《走钢丝的人》(*Man on the Wire*),均以在世贸双塔间走钢丝的表演为原型事件。作为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形象,“走钢丝的人”行走在刚刚落成的世界最高楼——世贸双塔之间,这场不可思议的行走表演向当时的人们传递的是对“平衡”的不懈追求,对“坠落”的彻底挑战,代表了人类技艺与勇气的崇高力量。然而,“9·11”恐怖袭击事件,世贸双塔相继在飞机的撞击下轰然倒塌,则传递着“失衡”与“坠落”的记忆片段。由此而言,“走钢丝的人”这一人物形象,在对历史预见的过程中,实现的是一种对抗性修辞,即“坚持一种版本的同时拒绝另一种版本的过去”<sup>④</sup>,以“永远不会坠落”的“走钢丝的人”实现对“坠落的人”的对抗性预见。因此,“走钢丝的人”不仅唤起了存留于20世纪70年代的集体记忆,同时也在21世纪的景观社会中,竭力实现德里罗曾特别撰文呼吁的、具有反思特性的文学再现方式:切入历史事件的内核,理性思索与展示事件带给人们的影响,进而疗愈全球性创伤<sup>⑤</sup>。

作为发生了两场历史事件的物理空间,世贸双塔的符号意义早已超越其场景景观本身。在世贸双塔刚刚落成的20世纪70年代,它代表着“一座美国想象的碉堡”<sup>⑥</sup>,而在后“9·11”时代,世贸

①Ann Kaplan. *Trauma Culture: The Politics of Terror and Loss in Media and Literature*.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7.

②Debarati Sanyal.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Review)”, *Substance*, 2002, 31(2): 303.

③科伦·麦凯恩:《转吧,这伟大的世界》,方柏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9—400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的简称“《转》”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④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文化记忆研究指南》,李恭忠、李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86页。

⑤Don DeLillo. “In the Ruins of the Future: Reflections on Terror and Loss in the Shadow of September”, *Harper's Magazine*, 2001, 303(1819): 33-40.

⑥科伦·麦凯恩:《双子大厦是一座美国想象的碉堡:科伦·麦凯恩访谈》,《东方早报》2011年5月5日。

双塔成为“归零地”。在小说中,麦凯恩将叙事时间拉回到双子塔刚刚落成的时候,凭借文学的虚构力量揭示了历史对称性、抑或历史规律性的预见意味。也就是说,“走钢丝的人”见证了双子塔的高耸入云,也通过走钢丝表演实现了对双子塔楼“善意的、诗意的”突袭,这在本质上与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上大楼具有相同的行为表演性质,但两场“表演”景观却带来截然相反的行为效果:“前者用‘平衡’的方式串联起永不交汇的双塔,后者则让双塔在‘失衡’的状态下永远交汇在一起。”<sup>①</sup>2001年,当人们面对骤然变为“归零地”废墟而不知如何排解创痛的时候,二十七年前行走世贸双子塔楼之间的杂技狂人,似乎为当下的受难者和旁观者预见了解救的希望。因此,相较其他重在见证当下的媒体报道,“走钢丝的人”在美国“9·11”小说中承载着更具“修通”意味的文化使命——文学塑造“走钢丝的人”这一历史预见者,将“坠落的人”所凝结的向死存在的“断裂”文化意蕴迁移至“走钢丝的人”所代表的对抗坠落、寻求平衡的“修通”文化愿景,从而体现了美国“9·11”小说修正官方叙事与媒体叙事“拒斥对话”局限的重要文化价值。

### 三 “陌生人”:文化“修通”的历史超越者

“修通”,原为心理创伤治疗中的一个专业术语,指的是创伤中解离的反过程,用以弥补解离导致的心理意识断裂,并逐渐打通那些互不认识的局部,使得它们逐渐聚合为一个整体。历史学者拉卡普拉将“修通”运用于历史编纂,将其视为自我与他者“具有差异性的共同卷入”(co-implication),而这一术语的伦理属性使人文学者可以在文化创伤疗愈方面发挥“修通”的积极面向,让“人文研究的伦理责任和政治能动性成为可能”<sup>②</sup>。在这个意义上,若要进一步探寻由“断裂”到“修通”的路径,个体与他者需要克服陌生人之间的隔膜,实现“具有差异性的共同卷入”,才能

在伦理层面实现具有超越意味的文化“修通”。

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看,前文所述“坠落的人”和“走钢丝的人”两个典型人物形象,都以“陌生人”的姿态在“9·11”小说中突然出现。无论是作为历史感知者的“坠落的人”,还是作为历史预见者的“走钢丝的人”,美国“9·11”小说都展现了人对这个充满“断裂”感的当下危机时代的某种陌生化理解。然而,“陌生人”这一人物形象的文化使命,应如拉卡普拉所言的“修通”,凭借邀请自我与他者的“共同卷入”,转换观察与感知的视角,在克服陌生的叙述中实现历史超越的文化使命。《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回声制造者》《遗忘》等多部美国“9·11”小说,频繁描绘“陌生人”在后“9·11”时代相遇的场景,不仅展现了个体之间、群体之间如何对待“陌生人”,“陌生人”如何应对融入共同体等后“9·11”时代亟须反思的社会问题,而且着力创造一种“共持新见、结成一体”的新型交往观念——在与“陌生人”面对面的过程中想象“陌生人”,塑造“陌生人”人物形象,从而产生事关“你、我、他”的新型人际关系。由此,“陌生人”这一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成为美国“9·11”小说突破创伤悲悼桎梏,超越时空局限,产生面向未来希冀的独特美学选择。下文以莫欣·哈米德小说《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2007)为例,探讨美国“9·11”小说中的“陌生人”形象作为历史超越者的文化价值。

“陌生人”这一人物形象在莫欣·哈米德的小说《不情愿的原教旨主义者》(*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又译《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sup>③</sup>《回到故乡的陌生人》<sup>④</sup>)中,得到了鲜明的呈现。对比这部作品的两版中文标题翻译,不难发现“陌生人”形象在小说中具有重要地位。2009年和2018年的两个中文译本,译者都使用了“陌生人”一词,而舍弃了小说原标题中“Fundamentalist”一词的直译。有学者曾撰文谈及哈米德在这部作品标题选取上的良苦用心:“哈米德巧妙地使用‘fundamentalist’一词,一语双关并置了西方对极

①王薇:《看与被看:〈转吧,这伟大的世界〉中的历史景观书写》,《当代外国文学》2015年第3期。

②但汉松:《以文学“修通”历史创伤?——兼论多米尼克·拉卡普拉的跨学科之思》,《山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③莫欣·哈米德:《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吴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④莫欣·哈米德:《回到故乡的陌生人》,孙璐译,文汇出版社2018年版。

端宗教的看法与对不情愿的金融家的看法。”<sup>①</sup>此番论述提示我们,哈米德标题的选择表明,作家并不满足于惯常地、单一维度地呈现“美国梦”破碎的巴基斯坦青年移民的个人故事,并不是如部分批评家所言是以“原教旨主义者”的刻板印象描述来引起普通读者的关注,而是注重在个体与群体、陌生与熟悉、主流与边缘等多维度之间形成异质意义的复杂交织,此种良苦用心也在其小说框架结构重在超越时空的精妙设计中有所体现。“9·11”事件以及随后的一系列反恐战事的发生,促使哈米德寻求一种恰如其分的叙事形式,充分展示当时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猜疑、敌对与冲突的关系。哈米德将故事设置为一种内外双层的“对话”形式,同时借此突显第一人称的坦诚、直白与第三人称的怀疑、愤怒甚至恐惧。在哈米德精心构建的内外双层叙事结构中,“陌生人”既以修补记忆的方式,在反复描摹“陌生人”形象的过程中对文化记忆进行反向凝固,又以后见之明的态度,在回顾与反思型叙事中丰富与发展“陌生人”人物形象。

具体来看,在《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的外层叙事框架中,叙述者为巴基斯坦青年昌盖兹,他在拉合尔的家茶馆中,向一名没有亮明身份的“陌生人”讲述自己的美国往事。在对“9·11”事件进行的惯常媒体再现中,“陌生人”通常是恐怖分子、或有恐怖分子嫌疑的穆斯林形象。然而,作家哈米德在小说《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反其道行之,创新性地将自始至终保持沉默的美国人设置为“陌生人”,充当了昌盖兹戏剧独白式记忆讲述的倾听者。在外层叙事中,“我”(从美国回归巴基斯坦的昌盖兹)以本地人的熟悉自在之感,向“你”——美国“陌生人”——尽地主之谊,在自己熟知的故乡茶馆中,从容不迫地、幽默风趣地、滔滔不绝地以过来人的口吻向美国“陌生人”讲述自己过往的记忆、人生经历与感悟。反观这位美国听众“陌生人”,全程沉默无语,哈米德始终没有让美国“陌生人”直接发出任何声音,而是不断以戏剧独白特有的方式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称呼来反复确认这位倾听者的存在,并通过“我”对“你”的观察,借“我”之口说出“你”的

一言一行。可以说,这种以伊斯兰的叙述声音为主导的戏剧独白形式,正是哈米德在数易其稿后最终寻找到的一种可以令敌对双方换位体验的方式,也就是说,这种独白形式不仅让向来处于失语地位的伊斯兰世界得到了发声、讲述、主导对话的机会,而且能够在后“9·11”时代,使始终拥有话语霸权的美国一方感受成为“陌生人”的恐慌与无助之感,从而使对峙双方有机会换位体验、换位思考,以此使原有的“陌生人”超越了沉默、失语的状态。

在小说的内层叙事结构中,承担“陌生人”角色的,不再是外层叙事结构中的美国听众,而是曾经怀揣“美国梦”的巴基斯坦精英青年昌盖兹。他以回顾往昔的方式讲述自己在纽约大都市中寻梦、迷失、惊醒、归乡的人生历程。从昌盖兹回顾过往的叙述方式看,叙述主体的“我”分裂成为“现在自我”和“过去自我”两个部分。在内层故事叙事中,昌盖兹的“过去自我”身处美国,以“陌生人”的身份,试图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反观昌盖兹的“现在自我”,与“过去自我”拉开了明显的距离,通过不断反思“过去自我”的言行,将其划归为自我认知中的“陌生人”。由此,整部小说的内层叙事结构形成“现在自我”和“过去自我”之间的“对话”,“现在自我”作为聚焦主体,对“过去自我”进行观照与凝视,发现并描述记忆中那个令自己感到陌生的自己。由此可见,一方面,小说的外层叙事框架以戏剧独白的方式向“陌生人”敞开心扉,以此实现文化“修通”过程中原本敌对的自我与他者的身份超越;另一方面,小说的内层叙事框架则形成一种“陌生人”的内在自我与内在他者之间的对话,以时间为拉开审视距离的手段,迈向的正是超越历史的“修通”之路。正如拉卡普拉所言,“凭借‘修通’,我们可以不再沉溺于创伤带来的殉道士光环,带着批评距离去审视问题本身,去区分过去、现在和将来,并借此让我们获得成为伦理行为人(ethical agent)的可能性”<sup>②</sup>。小说中独白与对话的内外交织,既勾勒出“陌生人”形象的多元轮廓,又以互为比较、互为参照的形式让“陌生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成为具备历

<sup>①</sup>David Gay. *Confronting Myths of Difference: Fundamentalism, Relig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Mohsin Hamid's 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Religious Studies and Theology*, 2011, 30(1):59.

<sup>②</sup>Dominick LaCapra.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44.

史超越者身份的“伦理行为人”。

美国左翼思想家特里·伊格尔顿在《陌生人的麻烦:伦理研究》<sup>①</sup>一书中,回溯自18世纪以来的“陌生人”哲学渊源并将其纳入全新的当下全球化共同体语境中,重新思考如何构建具有超越意味的新时代“陌生人”伦理。从美国“9·11”小说中“陌生人”形象的塑造来看,伊格尔顿构想中的、基于互惠团结的新主体相处之道获得了文学意义上的实现:纵然“陌生人”之间凭借情感之力实现联结存在一定局限性,但如美国“9·11”小说中的“陌生人”形象所示,文学的力量在于聚焦人性的光辉,发挥“伦理行为人”的力量,彰显介入现实、影响现实的社会价值。

### 结语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美国“9·11”小说并非仅仅延续现有文化语境中的既存形象,还创造出超越历史、预见未来的人物形象。文学作为文化记忆语境的生成媒介之一,可以把多版本的过去聚集在一起,正如纽曼在探讨文学对记忆生成的作用时得出的结论,虚构性叙事变成了一个实验室,我们可以在文化允许的范围内尝试着对过去进行各种可能的建构<sup>②</sup>。作为“实验室”的美国“9·11”小说,凭借文学想象与美学关注,既让后“9·11”人物形象变得清晰可见,又参与到后“9·11”时代个体与他者形成的对话之中,不仅传播后“9·11”时代文化记忆,更重要的是,参与创造具有“共持新见、结成一体”的文化记忆。

##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Characters in American 9/11 Novels

WANG 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9/11 terrorist attack has bee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new-era “founding trauma”. American 9/11 novels characterize several typical images to solidify, reflect and reshape post-9/11 history and culture.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generations of “falling man”, “tightrope walker” and “strangers”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Falling man”, functioning as the historical perceiver, mainly produces the solidified post-9/11 culture of “rupture”. “Tightrope walker”, serving as the historical foreseer, basically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event of acrobats walking on a tightrope between the twin towers of the World Trade Center in 1974 to “premeditate”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 in 2001, thereby foreseeing the way of “working through”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Strangers” aim to become the historical transcendent by appealing to “transferential co-implication between self and other”. These three types of cultural characters in American 9/11 novels are condensed into pre-and-post 9/11 history from “rupture” to “working through” and consistently release literary value in the post-9/11 context.

**Key words:** American 9/11 novels; characters; falling man; tightrope walker; strangers

(责任校对 龙四清)

<sup>①</sup>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n Ethics*. Oxford: Blackwell, 2008.

<sup>②</sup>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文化记忆研究指南》,李恭忠、李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24页。